

周秦汉唐文化工程·学术研究文库

材不材斋文集

—— 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 上编

# 中國古代史研究

ZHONGGUOGUDAISHIYANJIU

祝总斌 著



三秦出版社

材不材斋文集

—— 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 上编

# 中國古代史研究

ZHONGGUOGUDAISHIYANJIU

祝总斌 著



三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材不材斋文集: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/祝总斌著.  
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06.1  
(周秦汉唐文化工程·学术研究文库/魏全瑞主编)  
ISBN 7-80628-646-2

I.材… II.祝… III.中国-古代史-研究-汉代-魏晋南北朝时代-文集 IV.K230.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81639 号

周秦汉唐文化工程·学术研究文库

材不材斋文集

——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(上编)

中国古代史研究

---

祝总斌 著

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 
新华书店经销  
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 
电 话 (029) 87205106  
邮政编码 710003  
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 
开 本 850×1168 1/32  
印 张 13.375  
字 数 323 千字  
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 
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 1-1000  
标准书号 ISBN7-80628-646-2/K·266  
定 价 38.80 元

---

## 目 录

我与中国古代史(代序)·····	( 1 )
《史记》神农氏、炎帝为一、为二说考辨·····	( 16 )
有关《史记》崇儒的几个问题·····	( 35 )
有关《史记》歌颂汉王朝的几个问题·····	( 63 )
《史记》导读·····	( 84 )
马援的悲剧与汉光武·····	( 97 )
诸葛亮隐居地赘考·····	(115)
简评晋武帝在统一全国中的作用·····	(118)
评晋武帝的民族政策	
——兼论匈奴刘猛、鲜卑树机能反晋之性质·····	(126)
“八王之乱”爆发原因试探·····	(152)
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·····	(182)
素族、庶族解·····	(212)
刘裕门第考·····	(225)
晋恭帝之死与宋初政争·····	(240)
从《宋书·蔡兴宗传》看封建王朝的“废昏立明”·····	(274)
陶渊明田园诗产生的历史、文化背景·····	(285)
《四书》传播、流行的社会、历史背景·····	(304)
关于我国古代的“改法为律”问题·····	(323)
略论晋律的“宽简”和“周备”·····	(348)
略论晋律的“儒家化”·····	(375)
“律”字新释·····	(405)

一部别开生面的读史札记

- 简评周一良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》…………… (413)
- 评田余庆著《东晋门阀政治》…………… (417)
- 后 记…………… (426)

## 我与中国古代史(代序)

我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,纯属偶然。

在中学读书时,我数学学得不错,原打算毕业后考理工科。不幸因为家庭发生变故,1946年高中二年级结业后不得不辍学。一年以后再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时,没有学过高三数学、物理等课程的我,只得选择了因爱看小说而比较感兴趣的中国文学系。同等学历的录取比例据说是百分之五,我自然对报考名牌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,想也不敢想。大学考上了,自己并不满意。1948年春来到北平,由于特殊原因,先是在华北文法学院借读,秋后又转为正式生。1949年北平解放,不久我便走上了工作岗位,到过农村,下过部队。到这时为止,我对中国古代史还是很陌生的,有关知识也极浅薄(仅在大学里学过一点点)。用“一穷二白”去形容,决不过分。然而命运却注定要把我与中国古代史拴在一起,拴一辈子。1954年,由于某种机遇,我被调到北大,先在法律系辅导、讲授中国政治、法律制度史,开始部分涉及中国古代史;后转历史系,从此便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、研究工作,直到今天。

40多年来,原本“一穷二白”,后来一直也没有得到机会脱产学习、进修的我,其所以在中国古代史工作岗位上未遭淘汰,还能基本上完成任务,靠的便是北大学术气氛的熏陶,而主要以通过自学的形式来实现。在这一方面,我有以下几点体会。

## 厚积薄发

在燕园里很早就流行一个比喻：如果将讲课内容比做一杯水，那么教师本人的学识便应相当于一桶水，方能应付裕如。每当我在辅导、答疑中被同学问得瞠目结舌、背上冒汗之时，便自然而然想起这个比喻。这也就是要求教师厚积薄发。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借书，将王鸣盛《蛾术编》之“蛾”念é，一位老馆员委婉地指出我念了别字，当念yí，义同蚁。这“一字师”也再次提醒我学海无涯，自己知识太浅薄了，必须尽快地积累，再积累。

在摸索中，我不断积累目录学、文献学知识。这得力于藏书丰富的北大图书馆者甚多。50年代的馆员个个业务娴熟，工作认真负责，知无不答；而且教员可以自由出入书库，十分方便。当我逐渐懂得《书目答问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等，以及今人有关论著的价值之后，便以之为指导，将其中所载重要的或我感兴趣的书籍借回阅读，做卡片、索引，或径直在书库中浏览序跋等，广泛增加感性知识。同时也购置一些书，每月总要跑琉璃厂等地一趟，并把它视为极大乐趣。由于有了一些目录学、文献学知识，便懂得哪些书该买，哪些书可暂不买。如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便买王先谦《补注》、《集解》本；学术笔记首先买《廿二史考异》、《廿二史劄记》、《十七史商榷》；《周礼》买孙诒让《正义》本；《仪礼》买胡培翬《正义》本；《礼记》买孙希旦《集解》本；诸子则主要买世界书局的《诸子集成》本等。这些书都对丰富我的知识起了重要作用。不过，坦白地说，改革开放以前，和许多教师一样，对一些大部头的书籍如二十四史、四书五经等，是没有时间，也没有条件（包括“白专”帽子的威胁）像前辈学者当年那样系统阅

读、钻研,打下深厚功底的;<sup>①</sup>就我来说,充其量只不过是通  
一般浏览,有个大体印象而已。我的学力只能做到:借助于这个  
大体印象,加上直接间接利用各种各样的工具书(如“引得”)、辨  
伪书、类书,以至内容丰富的学术笔记(如《日知录》、《陔余丛  
考》)、论文等,一般能够尽快了解一部古书的真伪、价值、存亡,  
到哪里去查找佚文;或比较迅速地搜集到某一问题的有关资料。  
举一例:70年代初有一位邻居是北京林学院的老师,他认定我  
教中国古代史便该懂得查找唐宋时期牡丹栽植的历史资料,于  
是便把一外地来信请教他的这个问题,转托于我。虽然我从未  
接触,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,但还是答应了。因为我立即想  
到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中有《草木典》可以利用。后来果然以之为线  
索找到、整理了一份资料给他,据说回信后对方表示满意。不容  
置疑,我的答复肯定是肤浅的獭祭之作,因为我毫无研究基础。  
我举此例,只是想说明,作为一名中国古代史教师,即使基础较  
差,但如果能掌握一定的目录学、文献学知识,一旦研究一个课  
题,需要有关资料,大体上便知道通过什么方法,到什么地方去  
查,这对教学、科研都是颇为有用的(如我上课讲皇权制度,涉及  
朝会、常朝,首先去翻秦蕙田的《五礼通考》,以之为线索,扩大资  
料范围,便事半功倍)。虽然在这一方面我还远不能与前辈学者  
相比,但我坚信必须向这方向努力。

为了厚积薄发,除了史学知识、基本功外,还需懂得一些与  
之时有联系,比较专门的知识。如阅读先秦两汉若干文献和有  
关论文,音韵学便是一个重要拦路虎。很早我便对它感到头疼。  
后来下决心反复学习王力先生和其他先生的一些通俗著作,学  
会查阅《韵镜》、《七音略》,并懂得了一点基本知识,回过头再读  
有关历史文献和论文,涉及某些术语,便不感到那么神秘莫测

<sup>①</sup> 如吕思勉先生曾将二十四史系统读过三遍,见《蒿庐问学记》(三  
联书店1996年版)第3页。



了,有时还可以利用它。有一次写一篇有关门阀制度的论文,为了证明中古“庶族”这个词可能演化为“素族”,作为证据之一,便从音韵学上考证出审母三等字“庶”,和心母一等字“素”,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时可以相通,从而加强了论点的说服力。

官制和历史地理知识更为重要。钱大昕曾说:“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,次精輿地,次辨氏族,否则涉笔便误。”他还批评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作者李延寿“似未通南北朝官制,故诸传删省(按:指删略《宋书》、《魏书》等八书为南北史),多未得其要领。”<sup>①</sup>关于官制和氏族,因为篇幅关系,兹从略,此处只想谈一下我是如何积累历史地理知识的。如所周知,历史地理变化多端,难度很大。为了对它多少能有所掌握,有所利用,除了阅读当代权威论著(如谭其骧、侯仁之、史念海诸先生的文章)外,我还大体浏览了《尚书·禹贡》(参考胡渭《禹贡锥指》)、《汉书·地理志》(用王先谦补注本)、《水经注》(用杨守敬等《水经注疏》本,参考赵一清《水经注释》,对照杨守敬《水经注图》)三大经典。特别是《水经注疏》,1988年以前只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的影印本,共三大函,很笨重,从图书馆借阅需定期归还,用起来很不方便。于是我便将疏文某些重要部分,转抄在我的国学基本丛书本《水经注》的相关注文下。因为后者是小32开本,每页天地有限,为了多抄些,只得写成蝇头小字,再不够便贴上小纸条。每页看上去小字密密麻麻,纸条错错落落。如今有了段熙仲点校本,已经不用它了,但偶尔翻阅,一方面惊诧自己当年怎么会下这笨工夫;另一面心中也有一种欣慰感:在不断“阶级斗争”的缝隙中,我没有浪费自己的青春。有了一点历史地理知识,在教学、科研中便主动多了。如在一篇文章中我肯定晋武帝的民族政策,于是便不得不探讨当时西北地区绵延十年的鲜卑树机能反晋活

① 分见《廿二史考异》卷四十、卷三六。

动,其性质究竟是什么。很长时期以来人们都把它看成是少数民族起义,而我主要借助历史地理知识、《水经注》知识,经过反复考证,得出的结论是:树机能的反晋活动是叛乱而不是起义,是非正义的,从而使我的基本论点站住了。很清楚,评价晋武帝民族政策本是政治史论文,但如果没有历史地理知识,说服力便会大打折扣,甚至论点根本无法成立。

此外,我的体会是,文字学、训诂学、考古学、天文历法、科学技术、中外交通、文学艺术、哲学宗教等知识,也都需要不同程度地尽可能多懂一些;或一旦教学、科研中涉及这些问题,出了麻烦,立刻会到有关书中去查找答案。为此,又必须学习、掌握外文,增大信息量。我在60年代学的日文,尽管只能勉强看业务书,也在扩大知识面上派上用场。当然,前面强调要学习的各种知识,或许其中有些在中国古代史教学、科研中始终直接用不上,但多少懂得一些却可使我们对直接用上的知识掌握得更扎实,运用起来更有信心。

《庄子·外物》:庄子对惠子说,“夫地非不广且大也”,但人所“容足”之处只是一小块,是不是其他地方都“无用”呢?不是。他说:如果把除“容足”以外的土地全都挖去,其深“至于黄泉”,则“人(所容足之地)尚有用乎?”惠子答曰“无用”。庄子说“然则无用之为用也明矣!”用在知识上也可以说是这样。看来未能直接用上的知识,与直接用上的知识往往是互相关联的,就像“容足”之地与其外相毗连土地是一个整体一样。不能因为直接用不上便不去学它,成为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。没有直接用上,从总体上看,应该说,也是用上了。清代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卷一中说:“余每作咏古咏物诗,必将此题之书籍,无所不搜。及诗之成也,仍不用一典。常言人有典而不用,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。”这正是“无用之为用”的好例。袁枚虽然没有直接用上这些“典”,但有了这些“典”,心中有恃无恐(“犹之有权势”当即此意),作起诗来自然便得心应手,运用自如了。

## 精细读书

庄子说：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”。我国古籍浩如烟海，个人精力有限，自然不可能读任何一本书都精细，而应像弹钢琴一样，有重有轻，有疾有徐。有的很快地大致浏览一下序跋目录，记入卡片备查就可以了；有的，特别是和自己专业或科研课题紧密相关的重要书籍或篇章，则必须精读细读，遇到疑点难点，还必须联系上下文，甚至查找有关资料，反复琢磨。这样读书的好处甚多。有时可以透过字面，扩大、加深对问题的理解：

如《后汉书》的《百官志》，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者必读的一篇。此志写得比较简略，王先谦《集解》本有助于对某些问题的理解，但如果读时不精细，仍会把重要内容忽略过去。如在九卿“少府”属官太医令、太官令、守宫令、上林苑令之后，紧接着列有侍中、中常侍、尚书令和仆射、御史中丞等，最后说：“右属少府。本注曰：职属少府者，自太医、上林凡四官；自侍中至御史，皆以文属焉。”开始我马马虎虎地读，便以为这些官员全归少府统率、指挥。后来读书一深入，便发现其中存在一些矛盾难以解释。如尚书各官至东汉权力日益扩大，以至形成将取代三公为宰相的态势，怎么可能听命于少府呢！再如查刘昭注引蔡质《汉仪》，三公列卿等“行复道中，遇尚书仆射、左右丞郎、御史中丞、侍御史，皆避车，预相回避。卫士传：不得忤台官。（台官）过后乃得去。”按列卿中自然包括少府，如此则长官要回避属官，岂不违背礼制了吗？这些矛盾只有在仔细琢磨“以文属焉”四字，正确理解其涵义后方可得到解释。原来“以文属焉”就是“文属少府”<sup>①</sup>，它与“职属少府”不同。“职属少府”是真正听命于少

<sup>①</sup> 《通典》卷二一《职官三》。

府;而“文属少府”之“文”,是指法令条文之“文”。<sup>①</sup>“文属少府”是指仅在条文规定上,亦即形式上(包括朝会班次上)、名义上属少府,实际职务与少府无干。这一制度,西汉很长一个时期似不存在,诸尚书应该和太医令等同样“职属”少府,但后来尚书权力逐渐发生重大变化,其任务已经远远超出少府指挥范围,往往由君主直接过问,而积习难改,尚书品秩一时尚未能提高(如尚书令仅千石之官),不足以撑起独立机构,于是“文属”的办法便出台了。<sup>②</sup>这样,通过仔细琢磨,分清职属、文属,对汉代政治制度这一特色,也就加深了理解。

精读细读有时还可以正确掌握原文精神:

如《史记》卷一二四《游侠列传》有这么一段话:“由此观之,‘窃钩者诛,窃国者侯,侯之门仁义存’,非虚言也。”

这一段话常被今人引用,作为司马迁否定儒家仁义思想之强证。过去我也同意这一看法。可是后来我反复阅读上下文之后,发现司马迁并非此意。因为在这段话之前他明明说:“且缓急,人之所时有也”,并举虞舜、伊尹等“有道仁人”有时也难免陷于困境为例,证明如能帮助他们,体现仁义思想,具有极大社会意义。所以说:“鄙人有言曰:‘何知仁义,已殒其利者,为(谓)有德’。司马迁是肯定这“鄙人”之言的。因而在“由此观之”那段话之后及全文中,虽不否认游侠某些行为“时扞当世之文网”,但基本精神仍是肯定游侠“救人于厄,赈人不贖”等(隐隐包含可能“救”、“赈”像虞舜、伊尹这类“有道仁人”之意),合乎仁义之道,并说“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!”这样,联系上下文便可断定,司马迁绝无否定仁义思想之意,相反,是在通过这段话肯定游侠,宣

<sup>①</sup> 参《两汉刺史制度考》,载《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》(台北)艺文出版社1976年。

<sup>②</sup> 侍中、中常侍、御史演变情况与尚书不同,但“文属”性质则一。其他官府如光禄勋属官也有“职属”、“文属”之别。

扬仁义之行的必要性。然则又如何理解“由此观之”一段话呢？经过进一步琢磨，我发现原来司马迁对仁义的理解很朴素，和后来发展了的儒学有所不同，他仅只认为，肯于帮助他人，使之摆脱困境，得到各种利益，这种行为就合乎仁义之道。“窃国者”（如周武王）因为涉及面宽，从其举事中得到利益的人极多，称赞这一行动合乎仁义，故被拥为诸侯；而“窃钩者”因他人没有得到利益，没人称赞他仁义，拥护他，所以一犯法就被杀。“侯之门仁义存”的真正涵义便在于此。这样理解，和司马迁在《货殖列传》中肯定“人富而仁义附焉”（如陶朱公）、“富者得势益彰”（如子贡），其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。固然，“窃钩者诛”等三句话，司马迁转引自《庄子·胠篋》，原意确是讽刺、反对儒家仁义之道的，但先秦两汉学者在发表议论时，常有引前人的话反其意而用之的风气，甚至还有捏造史实以证明自己观点的，司马迁未能免俗，是毫不奇怪的。这样，“由此观之”一段话的精神，本来易被误解，经过反复阅读，也就不难正确掌握了。<sup>①</sup>

精细读书有时还可以发现原书及其注疏中的错误：

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三九：南齐郁林王即帝位，与大臣萧鸾矛盾尖锐。支持郁林王的杜文谦敦劝郁林王的宠臣綦毋珍之，赶快联络掌兵权的人先下手为强，“勒兵入尚书，斩萧令”，“若迟疑不断，复少日，录君称敕赐死（胡三省注：鸾录尚书事，故称录君），父母为殉，在眼中矣。”（以上依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、1957年第二次印刷，今人标点）：

然而据《南齐书》，齐武帝临死遗诏仅以萧鸾为“尚书令”。萧鸾“录尚书事”是在发动政变杀掉郁林王，拥立海陵王为帝后自封的，则在此之前与郁林王斗争时，何来“录君”（录尚书事）头衔？何况《通鉴》正文杜文谦明明白白说的是“斩萧令（尚书

<sup>①</sup> 以上看法详参拙作：《有关〈史记〉崇儒的几个问题》，载《国学研究》第二卷，北大出版社，1994年。

令)!”!胡三省此处读书不细,注释出错,今人标点又受其误导,将“录君”作为名词下属。其实,正确标点应该是:“若迟疑不断,复少日录君,称敕赐死”云云。这里“录”是逮捕之义。綦毋珍之极受宠幸,如萧鸾夺郁林王位,必定杀珍之,故杜文谦才以“复少日录君”这一利害关系打动他,要他先下手。

我就是这样在可能条件下通过精细读书不断受益的。有时还可以在此基础上“由此及彼”,发展成科研论文。如上述《史记》卷一二四《游侠列传》之例,便触发了我进一步研究的兴趣,并成为我后来发表的有关司马迁崇儒论文的一个重要支撑点。

### 论从史出 追求新意

从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,有很长一段时期,史学界十分强调“以论带史”;甚至“论”也强调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。那时我在法律系讲授中国政治、法律制度史,曾撰写、不断修改了几十万字的讲义,全都体现这一精神。虽然我对史料还是注意搜集的,但仅只为了反复证明权威之“论”的正确。具体说,就中国古代部分言,就是不管历史上任何时期政治、法律制度发生任何变化,结论都是预定的;其指导思想全都被认定是为了加强镇压奴隶、农民反抗的需要,即阶级斗争的需要。为此,有时还不得不曲解史料。记得有一次讨论,我的发言出了格,强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,便遭到批评。从此,我便被“以论带史”紧紧箍住。老实说,这样做,倒也很省心,只要搜罗一些足以说明统治阶级残酷剥削、镇压劳动人民的史料,塞入既定框架中就可以了。然而有时也会感到乏味和苦闷,难道科学研究就是这样不断重复已有现成的结论吗?

60年代初,读到翦伯赞先生几篇论文,大受启发。他反对“把史料硬塞进原则中去作为理论的注脚”,反对“挑选材料只是

作为原理原则的注脚”，“用史料去迁就理论”。<sup>①</sup> 这正中我的弊病。他十分强调从具体历史中概括出结论来。这也就是“论从史出”。如果真能做到这一步，也就必然会有创见，会有新意。改革、开放以后，有条件了，我努力追求这一境界。

所谓“论从史出”，如果从广义理解，也可以把“论”理解为一种看法，则小至一个字、一件事、一项制度等的考证，只要史料确凿，见解新颖，都应该是“论从史出”。这种“论从史出”，大体也就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考证，也可以说就是“微观”。对于史学研究来说，它是决不可少，决不可忽视的。因为古代史料脱漏、错讹、长期误解，在所难免。如果不加考证，去伪存真，而是囫圇使用，以之为依据提出宏观看法来，也许不知哪一天便会像建立在沙滩上的大楼一样，倒塌下来的。五六十年代有些宏篇巨著，今已很少有人问津，原因之一即在于此。所以对于一些在关键问题上的精彩考证，必须给予高度评价，有些考证决不亚于一篇大论文或专著。我自己从来对这类“论从史出”、考证都是十分欣赏的。也曾在这方面做过一番努力，发表过《刘裕门第考》、《庶族、素族解》等文章。不过，总的来说，我的兴趣还是偏重在探讨一些分析性、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上。即将“论从史出”之“论”，多从宏观方面着眼；而把一些微观考证作为“论从史出”中“史”的组成部分，为宏观看法服务，力图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，将宏观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。关于偏重宏观，古代学者早有类似论述：

清初学者刘献廷在其名著《广阳杂记》卷四中说：“历代史册，浩繁极矣！苟不提挈其纲领，便如一屋散钱，无从着手。”所谓“提挈其纲领”，他指的便是要用史料说明一些“关系重大”的问题，以达到“识古今之成败是非”的目的。这是很有见地的。

<sup>①</sup> 分见《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》，《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》，载《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》（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）。

我写专著《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，便是通过对大量“散钱”即史料的搜集与考证，力图“提挈其纲领”，探讨这一段时期内，在不同客观条件下，宰相和秘书咨询官员出现、发展的原因与规律，以及相互之间，并与皇帝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，而不仅限于具体制度的罗列及其变化的介绍。

关于究竟如何大处着眼，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，我的体会如下：

第一，需要提高理论水平、理论概括能力。我自己在50年代是十分认真地、自觉地学过一点理论的，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、政治经济学等。原著如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反杜林论》、《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》、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等，可以说都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下来的。尽管它们的具体内容，后来逐渐模糊了，但它们分析历史与现实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灵活性，毫无教条气息，以及高度抽象概括的方法，却在我头脑中不同程度地留下痕迹。使得我对一些辩证、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念，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、个人与人民群众、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的相互辩证关系，能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与掌握，这便有利于宏观地把握史料，提高“论从史出”的理论性。

例如我的《陶渊明田园诗产生的历史、文化背景》一文，联系儒家正统文学观、玄学、门阀制度、江州农业生产状况、陶渊明宦途失意亲自参加一些劳动等因素展开论述，便是以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相互辩证关系，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体现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来进行的。又如《有关〈史记〉歌颂汉王朝的几个问题》一文，关于《史记》不可能以批判、反对汉王朝为指导思想的想法，则是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，分析司马迁的家世、教育、仕宦经历之后得出的。

第二，需要具有比较宽广的我国古代社会、经济、政治、思想文化各方面的知识；或一旦涉及这些问题，懂得如何很快查到、



了解。其实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“厚积”，而且是其中的主体部分——系统的中国通史基础知识。过去我写过《略论晋律的儒家化》一文，初稿送周一良先生请教，他便指出：研究晋律和礼、法关系，不能局限于晋代，要“上挂下连，非于通史精熟者不办”。这对我启发很大。通过后来教学、科研实践，我深深感到，如果没有系统的通史知识，纵使有着很高理论水平，宏观思维，面对有关课题，也只能是望洋兴叹，无从下手；或虽然下手，也不能不是捉襟露肘，主观地概括出几句干巴巴的教条，“以论代史”而已。相反，通史知识越丰富，掌握得越深入细致，有关史料越娴熟，进行教学、科研，分析问题，也就越能左右逢源，得心应手。

最近我写了《〈四书〉传播、流行的社会、历史背景》一文，其所以能宏观地认定主要是《四书》适合宋代以后各王朝力图以之教育官员及其后备力量一般士人“明天理，灭人欲”的需要，而不是为了毒害广大劳动人民，正是以具有唐宋之际社会、经济、政治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些通史知识，以及经学、理学的一点比较专门的知识为前提的。没有这些知识，便不会了解宋代的新特点，也就不会考虑宋代以后官员、士人思想意识、道德品质的教育，和完备法令制度相比，在巩固王朝统治上的重要性，已上升到新的高度问题，也就写不出这篇文章了。当然，我这篇文章的论点是否站得住，是另一问题。我举此例，只想说明，各方面知识包括通史知识多一些，必然有利于教学、科研中大处着眼，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。

顺便一说，上面提到理学知识，我还要特别感谢冯友兰先生的《中国哲学史》，它对我学习哲学史知识帮助极大。这书从30年代版本，到60年代《新编》，再到80年代《新编》修订本，我全都一一购买、拜读，有的篇章是反复拜读若干遍。这是把极难读懂的哲学史史料，一个字一个字真正读懂、理解、消化后，概括出来的具有精辟见解，而又深入浅出的一部巨著，是一部高水平的“论从史出”之作。从中国哲学史专家学者的角度，或许对冯先